

資產階級財政理論批判

吳兆華 邓子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產階級財政理論批判

吳兆華 邓子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

資產階級財政理論批判

吳兆莘 邓子基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建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7 1/4 字数 142,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4074·329 定价：(八) 0.58 元

封面設計：徐學成

目 录

一 导 言	1
二 关于英国古典学派的財政理論述評	12
(一) 英国古典学派財政理論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12
(二) 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国家觀和国家經費的 消极意义	23
(三) 英国古典学派的租稅理論	38
(四) 英国古典学派的公債理論	68
三 关于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財政理論及其批判	87
(一)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財政理論的时代背景	87
(二)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国家觀和国家支出理論	97
(三)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租稅理論	118
四 关于凱恩斯学派的財政理論及其批判	136
(一) 凱恩斯学派財政理論产生的时代背景	136
(二) 凱恩斯学派的国家觀和国家支出理論	145
(三) 凱恩斯学派的租稅理論	169
(四) 凱恩斯学派的公債理論	186
(五) 凱恩斯学派財政理論的彻底破产	200
五 結 語	217

一 导 言

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形成、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同时，资产阶级的财政理论也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所制约，从不同的国家观中，可以产生出不同的财政理论。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至没落，经历了漫长岁月，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财政的研究、设计，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由于在各个不同阶段他们主观愿望的不同，因而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之间也有很多而又很大的差别。但其中有一共同之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财政理论上自始至终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巩固服务，自始至终就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总的说来，他们都以资本积累为财政活动的中心，企图通过财政领域的种种措施为辅助来发展、巩固资本主义，来挽救资本主义，从而保证资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把反对封建制度以及封建的财政制度，特别是租税制度，作为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手段。促进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财政是资产阶级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杠杆。原来作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制

度作斗争的哲学而产生的自由主义，在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已成为犀利的武器和支配的思想，它的发生、发展不仅在政治上导致了议会政治的产生，而且在经济上，充分保障自由竞争。这时候，国家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为使个人资本的活力得以充分发挥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说，必须压缩国家权力，使国家的职能仅限于这一范围而不超越这一范围。与国家职能的这种限制相适应，财政的作用也必有所限制。认为“最廉价的国家才是最良好的国家”的说法，其主要理由就是国家支出的非生产性，从而主张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就充分表现出国家的财政具有消极的、消费的意义。

英国古典学派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财政理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从产业革命萌芽和实现的过程中，亲眼看到资产阶级的兴起并肯定了它所担负的经济使命，因而他们不仅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财政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亚当·斯密以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就充分表现在财政理论上。他所要求的是扫除一切保护、限制的政策，确立“明白而简单的自然的自由主义”。他根据“自然的自由主义”，主张极端限制国家职能。在他看来，只有在筹措国家为完成其必要职能所需的经费中，才能构成财政。国家职能既在自由主义之下如此被压缩，那末国家的活动以及由国家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筹措，也就被视为“必要的害恶”。亚当·斯密论到租税原则时，仅止于阐述以所得为对象而征课的所谓平等原则，以及征课技术和财务行政上所应遵循的原则，至于以充实国家经费为前提的课税原则，则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展。亚当·斯密在論述租稅四大原則之外，还述說了隨租稅的課征給國民經濟带来的害处，以及应如何使稅收減到最少限度。亚当·斯密还根据其生产概念，以物质財富的利用和增加为前提，認定政府的經費終归全部用于不生产的消費，認為公債是因某种用途而抽出的資本，因而对一国的資本积累是不利的。

李嘉图的財政論大体依照亚当·斯密所說，認為国家行为是不生产的，把政府行为所需要的經費看作是消費的，因而他也把尽量縮小政府行为范围和尽量使租稅負担成为最小，当作是經濟发展的必要条件；凡是阻碍資本形成的租稅，都是他所反对的。李嘉图認為，“凡属租稅，都有减杀蓄积力的倾向”〔1〕。政府的經費既是不生产的，那末政府以募集公債的方法来筹措經費，那就相应地削減了一国的生产資本。

英國古典学派的財政理論，反映了資本主义在发生、发展期所需要采取的財政措施，也是資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財政理論。古典学派的財政理論和它的經濟理論一样，为新兴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切障碍，为它的前进开辟了道路；它是为新兴資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在英法两国資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已在历史发展中暴露无遗，資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間的斗争日益采取了公开威胁的形式。从这时起，作为阶级統治工具的国家就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权力來設法緩和这一形势。資产阶级財政学中的所謂社会政策學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誕生的。这种社会政策特別盛行于德国，它的財政理

論特別為德国社会政策学派所鼓吹，这不是偶然的。德国 19 世紀后半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使鐵血宰相俾斯麦感到十分煩恼。他在國內所施行的經濟政策以下面三点为根据：第一是經濟的，要想克服国内的产业蕭条；第二是社会的，要“救濟”劳动人民；第三是政治的，要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說得更确切些，他的所謂經濟政策实质上是为了鎮压社会主义运动而筹划的〔2〕。俾斯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者或进步的学者极力加以鎮压；一方面又察觉到单是这样做对自身并非完全有利，所以又对劳动者运用怀柔政策。所謂社會保險立法，就是以“积极增进劳动者的幸福”的姿态出現的。社會保險的經濟效果对产业資本家大为有利：第一，这一措施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間接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增加劳动力的来源〔3〕。为俾斯麦这种政策設計并担任策士的是社会政策学派的重要人物瓦格涅之流。他們把俾斯麦的意图体现到財政理論上来，作为其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策略。

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派而出現的德国历史学派，一方面反对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張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人經濟活动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力言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必要，容許劳动者團結的权利，而強調所謂資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間的協調一致。这种社会政策的經濟理論以及財政理論，无疑已把亚当·斯密所曾深切注意过的經濟学与倫理学二者間的界限在所謂“文化”“历史”“人类进化”“人类精神生活”等等名义下撤除得干干净淨。他們否認經濟規律的存在，甚至以道德目的、法規等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空談来代替經濟研究，

理論思維讓位于政策思維。尽管他們奢言所謂要改善劳动者状况，但其精神实质却在坚决反对社会主义。1873年，他們几乎网罗了德国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組成社会政策学会，即所謂“講坛社会主义者”。这个組織統御着学术界，实际上結成了一种政治势力。俾斯麦曾想利用这一势力实行其經濟政策。作为俾斯麦的御用学者，瓦格涅要求在財政理論上容納所謂社会政策的見解，因而国家的任务也不象自由主义者所說的那样應該局限于法律目的的狹隘範圍以內，而必須加强干涉。国家应当“增加文化福利設施”，并对于“下等人民”的向上采取必要的措置予以“支持”。他們特別企图利用租稅來“矯正”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国民財产的分配，來“矯正”个人所得和个人財产的消費。他們高喊消除分配領域里的弊害来欺蒙广大人民。在社会政策学派的財政理論中，瓦格涅的財政理論是影响最广而蠱惑性最大的一个典型。瓦格涅的財政理論，不仅在德国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使資本主义各国以及一般改良主义者也都受到广泛的影响。瓦格涅为成熟的資本主义制造的財政理論，主要是为德国的容克和資本家服务的。

世界資本主义进入了它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即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資本与劳动的矛盾（資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人民間的矛盾），各个壟斷集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間的矛盾，帝国主义統治集团与殖民地、依附国广大人民間的矛盾，都日益发展和尖銳化。尤其是俄国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上劈开了一个极大的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欧洲和亚洲各人

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資本主义体系，民族国家勃兴，这就使資本主义总危机由第一阶段发展到了第二阶段。在总危机时期，由市場問題尖銳化所造成的企业經常开工不足，經常的大批失业人員的存在，工人阶级貧困化的加剧，以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日益动摇着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不断加强对本国人民的剥削而使他們破产和貧困，不断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別是落后国家的人民，不断挑起战争以及实行国民經濟軍事化，这些虽然保証了壟斷資本获得壟斷高额利潤，但也反过来加深了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对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在瓦解过程中矛盾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发生很大的影响。为了掩饰现代資本主义种种矛盾尖銳化的真正原因，为了替壟斷資本集团在国内外奉行反人民的政策作辯解，于是在資产阶级政治經濟学中一种“新”的理論也就应运而生。这一理論就是臭名远揚的所謂凱恩斯主义。凱恩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用福斯特的話來說，“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产物”〔4〕。也就是資产阶级的一种最反动的意識形态。

凱恩斯从青年进入壮年，大英帝国已从黃金时代进入衰落时代。他亲自目击“和平繁荣”的毁灭，資本主义体系的分裂，經濟危机一次比一次（特別是 1921 年的經濟危机，1929—1933 年空前深刻化的世界經濟危机，和 1933—1936 年的“特种蕭条”阶段）更加严重，以及資本主义制度中失业現象的严重。因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資本主义經濟逐漸衰落的时代。但凱恩斯不放弃資产阶级的剥削哲学，却想乞助于經濟手段以至財政手段来更“聪明地”“管理”資本主义經濟，来更“有效

地”弥补資本主义的缺点，来更“現實地”医治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义，特別是想利用国家以及国家財政来挽救資本主义經濟。他不認為壟斷資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腐朽的种种現象都是資本主义經濟体系业已完全破产的标志，还企图通过国家对經濟生活的“調節”把資本主义引进所謂“有調節的資本主义”的“新”阶段。凱恩斯在1933年发表的“走向繁荣之路”中提出了他挽救資本主义的方法，認為增加通貨，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支出（特別是增加政府支出，如举办“公共工程”之类），是走向繁荣的主要步驟。1936年，凱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在这本書中，他再三強調要加強国家的干涉和扩大政府的职能，要由国家通过租稅、公債、利息率政策以及其他手段来調整消費傾向；要用通貨膨脹，降低工資，降低利率与扩大預算的办法来增加公私投資。他認為把某些調節职能交給国家，不会引起“資本主义的灭亡，反之，会保存和巩固資本主义”^[5]。凱恩斯甚至明目張胆地認為无限制扩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职能，“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讓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6]。

凱恩斯主义者的經濟理論以至財政理論，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时代最反动的一个典型。他們硬說国家有能力“調節”和“組織”經濟生活，防止經濟危机和消灭失业；同时也把国家支出看作是有利的因素，看作是“刺激”需求的手段，和生产增长的推动力，甚至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他們无限制地贊美国家支出，甚至把赤字預算的繼續也視為国家經濟繁荣所必需。

凱恩斯主义者認為政府支出的任何裁減只能造成悲慘的結果，而預算平衡的觀念則應列入陳腐的經濟理論範疇之內。這種財政理論的始作俑者是凱恩斯，美國漢森之流，更为推波助瀾，進一步发展了他的這些荒謬論點。凱恩斯認為大批公共支出的刺激，足以迫使工業“抽水機”的開放，從而导致徹底的經濟繁榮，以及私人企業的扩充。在實行“抽水機”開放政策的初期，不會有人對於預算（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自行平衡發生疑問，因為在經濟繁榮恢復之後，政府收入可以大形增加，國家支出可以逐漸減少^[7]。根據這種“新哲學”，他們認為國家應在經濟危機時期增加公共支出，而在繁榮時期減少支出；換句話說，就是在壞時期不必要求預算的平衡，好時期可以要求預算平衡。他們對此所用的好聽的名詞叫做“補償的財政政策”。他們把預算上的現金赤字美其名為“財政部對於購買力的純貢獻”或“生產所得的支出”^[8]。漢森則用“創造純所得的支出”，而不用“財政赤字”。他們鑑於1937年的危機，又製造出一種理論，即預算赤字的減少不管是由於租稅的增加，抑或由於支出的減少，抑或由於二者的聯合，就會對經濟發生緊縮的影響而導致恐慌的來臨^[9]。這一說又使預算自行平衡的理論不攻自破。

漢森在“戰後——充分就業”這一本小冊子中，強調財政支出對經濟繁榮與充分就業的重要性，而沒有主張維持預算平衡。他說：“每一文錢的支出（無論公的私的），都成為同一社會其他分子的所得；成本與所得二者，實在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而已”^[10]。在公共支出中，他無視所謂“成本”是由征自勞

动人民血汗收入所汇成的大量經費支出，而“所得”則為壟斷資本家所获取的最大限度利潤的一種形式，企图用“同一社會其他分子”这一名辭來替代壟斷資本，來掩飾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剝削的本質。

凱恩斯學派雖然把赤字預算的繼續作為國家經濟繁榮所必需，而將預算平衡的觀念列入陳腐的經濟理論範疇之內，但對財政收入來源仍不能不以其絕大部分乞靈于租稅。凱恩斯之流說，可以依靠租稅制度，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均衡，即用租稅作為調整國民收入的方法，以消除財富分配不公平的現象。這類說法的用意，在於掩飾英國所實行的租稅制度把全部負擔都放在人民群眾肩上的本質。其實，他們無意于減輕租稅，也無意于財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更無意于加重資本家的稅負和限制他們的利潤，尤其無意于減輕一切勞動大眾的租稅重擔。他們從來是，將來還是，想通過租稅來重新分配國民收入，不過重新分配的目的不在于財富的公平合理分配，而是造成更大的懸殊與不公平。他們還想在“充分就業”期中，利用租稅來防止通貨膨脹。

漢森不僅相信沒有維持預算平衡的必要，並且認為要獲得經濟繁榮和充分就業實在需要繼續擴充公債。他說：“政府繼續增借公債，以公共支出的方式來解決長期失業問題，實在是一種保守性的建議。”^[11] 他把公債的增長說成是增進全國福利的手段，是“實現公共政策的工具”，是“一項統制國民收入的方法”是全國處于幸福狀態的象徵。照他看，把公債“如與租稅機構相配合，可以用来管理所得的分配”。^[12] 漢森認為

國內公債并不具有任何私人債務的特徵，甚至不應該把它稱為債務。基于公債只是一種貨幣所得的轉移而非真正債務的理論，他認為對於公債的繼續增加可以不必有所顧慮，公債的繼續增加可以作為實現充分就業和促使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關於債務費用漢森並不打算在公債用途及其效果上取得補償，却又乞助於租稅的增征和提高稅率，這樣，所謂公共支出的籌措最後仍然不得不全落在廣大勞動人民的身上。事實上，如果脫離了一切租稅而欲實現他們所期望的財政政策是不可能的。由於公債“新哲學”在美國流行相當廣泛，可見美國公債和公債利息的惊人增長決不是偶然的。

凱恩斯視戰爭為增加支出和加強“乘數”活動的最“有效”方法，所以他說，戰爭“是政治家認為大量舉債支出之唯一正當用途”〔13〕。

所以，凱恩斯學派的財政理論是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服務的。為了保証壟斷資本家攫取壟斷高額利潤，他不惜提出最無耻最反動的財政理論，甚至連煽動戰爭也成為他財政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中還有其他若干流派，但以上述英國古典學派，德國社會政策學派和凱恩斯學派有着較大較深的影響，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凱恩斯學派。這個學派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以擊敗社會主義和挽救資本主義為中心目的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最狡猾和最危險的流派”。它的理論的實施雖“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但它能夠推延和曲解這種危機，特別是它能夠迷惑工人和其他的民主階層”（福

斯特語）。我們針對英國古典學派、德國社會政策學派和凱恩斯學派的財政理論進行分析批判，目的在于使人們對於資產階級財政理論的本質有明確的認識，而不為其所惑。

資產階級財政理論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上自然會在較廣大的範圍內萌芽滋長，但當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經濟領域取得基本勝利以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借口要對凱恩斯主義予以了解，企圖用凱恩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來指導我國的財政工作和財政政策。現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陰謀已被粉碎了，但通過批判進而揭露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和財政理論的階級本質，仍然是我們在思想戰線與政治戰線上的重要工作之一。為這項工作貢獻一份力量也正是我們寫作本書的目的。以下我們就分別分析批判英國古典學派、德國政策學派和凱恩斯學派的財政理論。

-
- 〔1〕 李嘉圖：“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中華書局版，第 110 頁。
 - 〔2〕 加田哲二：“德國社會經濟史”，商務印書館版，第 260 頁。
 - 〔3〕 同上書，第 265—266 頁。
 - 〔4〕 見“政事月刊”1948 年 1 月號，第 27 頁。
 - 〔5〕 凱恩斯：“勸說集”，俄文版，第 321 頁，轉引自伏爾金：“凱恩斯是壟斷資本的思想家”，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9 頁。
 - 〔6〕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聯書店版，第 322—324 頁。
 - 〔7〕 參考毛爾頓：“公債新哲學”，商務印書館版，第 10 頁。
 - 〔8〕〔9〕 參考同上書，第 11 頁。
 - 〔10〕 美國國家資源計劃局出版，經漢森簽字的小冊子：“戰後充分就業”，第 5 頁。
 - 〔11〕 漢森：“財政政策與商業循環”，第 181 頁。
 - 〔12〕 同上書，第 185 頁。
 - 〔13〕 同〔6〕書，第 110 頁。

二、关于英國古典學派的 財政理論述評

(一) 英國古典學派財政理論的 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

雖然英國古典學派的財政理論為它的經濟理論所淹沒，沒有成為獨立的財政學，而且不如在政治經濟學上享有的盛譽，但要論及資產階級財政理論之初成體系，就不能不溯及英國古典學派的財政理論，以這些理論作為一個开端。

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以亞當·斯密為先導，以李嘉圖為後繼，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成就上有相當的貢獻。在資產階級財政理論的形成上，古典學派所取得的成就雖不及其經濟理論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但就其促進並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作用看，就其理論影響之深遠看，就其把財政理論與經濟理論熔於一爐看，也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價值。

他們之所以有如此的經濟理論以至財政理論，首先與他們所處的時代和所承受的思想淵源有關。

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正當資本主義的黎明期。他的

經濟見解以及財政見解，都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前夕形成的。亞當·斯密的財政理論以 1762 年至 1764 年他所講授的“關於司法、警察、歲入及軍備的講義”為嚆矢，這一講演集雖於 1896 年才經校閱考証後出版，但已為 1776 年出版的亞當·斯密大著“國富論”具备了一個雛形。

英國在 17 世紀中期，繼稱雄海上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之後，開始成為一個握有海上霸權的大國，並與法國展開了劇烈的競爭。它們彼此之間，成為掠奪海外殖民地的對手，常常引起戰爭。在 18 世紀的幾次戰爭中，英國幾乎沒有一次不曾參加。首先，英國為對付海上勁敵荷蘭人，於 1651 年頒布了“航海條例”，規定凡自英國殖民地輸出，或向英國殖民地輸入的貨物，概須以英國船隻載運。這樣，就使荷蘭人在對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貿易中受到了排擠，以致引起 1652—1654 年的英荷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英國獲得勝利，於是荷蘭不得不承認英國的“航海條例”。1688—1689 年，英國經過“光榮革命”而與荷蘭聯盟。這時英國的商業殖民野心實際上已發展到與法國白刃相接的地步。1689—1697 年的帕拉替內特戰爭中，英國、荷蘭便與奧大利、西班牙兩國的哈布斯堡族以及其他歐洲國王攜手，合力向法國進攻。當歐洲大陸戰火猛烈的時候，英法兩國在它們美洲的殖民地也互相打起仗來。經過此次戰爭，法國海上的實力終不容易恢復。1702—1713 年，法國波旁族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族爭奪西班牙王位，此時西班牙擬接受路易十四的孫子做國王，因而便和法國聯合。英國鑑於法國的公司在西班牙屬的美洲殖民地漸有獨占黑奴販賣權的趨